

在中西交汇中营构汉诗奇景



诗坛隐士路东的首部诗集《睡眠花》终于面世，收录其四十年间创作的近百首诗歌。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时期的路东，长期远离文坛独立书写，以边缘化姿态，徜徉于隐秘之径，不求闻达。作为南京“语言诗派”主将，路东一向孜孜于语言边界的探寻，热衷于发掘被日常语言习惯遮蔽的词语隐义，试图在构词法与发音的层面，让意义浴火重生，于一派淡定自持中见出雄心所寄。在那里，古典诗学、解构诗学、语言哲学的交汇，现象学还原、禅宗趣味、士大夫情怀的融合，生成敏感、丰沛和高远的主体言说向度。

《唐朝》运笔轻盈而气吞万里，语言的折叠与打开，几可谓随心所欲，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张力与弹性惊人：“看见了唐朝/所谓唐朝/只有两个人/一人写书/一人种花/写书的人/虚构了国家/宫廷与墙/疑点丛生/花开唐朝时/种花的人/在纸上散步/路旁的事情/一笔带过/田野空荡/插图的庄稼/喂养了我们……花开唐朝/大雁塔的鸟/朝我们喊叫/慈悲的孩子/骑陶瓷的马/一路冥想/一路向西”。全诗气象浩瀚复又灵转自如，让语言突破了常规逻辑，充分变幻出新奇之美，极富创新性和挑战性。

以平实的语言，表达高深莫测之思，这是才华和创造力的体现；反之，则为低能和呆蠢的彰显。《须弥山》写道：“梦之外和尚们敲打木鱼/一些灵魂正在秘密转世//高大的香树挂满了句子/我猜想有人靠造句成佛//梦最高的地方就是山顶/山下的事物在深渊生长”。如是，路东的文本，句式简洁，朗朗上口，善用单音节字和短句子，形貌上是新潮的另类的，骨子里是东方的和中国的。大道至简，大匠无工。与其说路东善于断句，毋宁说，他用的多是中国特色的短句，而非西化的长句。

“我看它的白影子/它的影子在风中/比古老的白马白/比白马跑得更快/风先吹动了白/然后吹动白影子”（《它》）。急管繁弦而有条不紊的句式，彰显舍我其谁的雄烈之才。路东，这个李白式的奇才，写作状态往往如天马腾踏，奋蹄撒欢。于是，马，成为路东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每写及马，写及与马相关的物事，写及马的飘逸奔跑与轻灵游移，他常常文不加点，情难自禁，进入张扬而富节奏的狂欢式表述。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当许多同行还在一本正经地沉溺于词语推敲和修辞取舍时，路东早已一骑绝尘。

路东笔下营构的一系列神奇场域，如马城、广场、杂货铺、大海、白山、须弥山、多边形的房子等，与其说是物理性的，毋宁说是心理性和精神性的，它们属于杂糅了经验与超验的另一层面，是亦真亦幻的“魔都”物事、“迷楼”陈设：“马城。我在这页纸上即兴写出了马城这两个汉字/全世界的马都在往马城里跑/此刻是什么时刻？十字路口的棋摊上兵荒马乱/楚河边的马，身体蜷曲，在残局中蹩了腿/此刻我一个人在马城兜圈子，一些马马虎虎的马/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马具店的墙上/挂满了缰绳和马鞭……骑马找马，这是此刻我最想干的事了，骑着它/离开马城，我去找一匹若有若无的马/一匹长得有些不像马的马”。《马城》从非常态情景切入，阔大纵横，动感十足，

文本主体自由穿梭于语言的缝隙，在一群人欢叫的情景中上下翻飞，生成妙不可言的超现实语境，营构出盛大的汉语欢宴。语言本位主义者路东，煞有介事地把玩文字游戏，在虚实相济中自证本性，吟鞭所指处，正是澄澈而繁复、闳约深美的汉诗源头。

路东诗风，常如大河行大舟，疾逾飞箭；似大风负大翼，鲲鹏图南。此类诗人，只需留得诗作少许，足矣。路东的文本每每以实击虚，以虚带实，既惝恍迷离，又明晰可辨，决不凌乱、紊乱和混乱。海德格尔与唐诗，胡塞尔与周易，陌生的西洋气息与亲和的东方风调，如同香蕉的黄色外皮与白色内心，在路东那里毫不违和地融为一体，有效保障了读者层的愉悦接受。

“造一座白山每天朝上爬/到了山顶才听见风声//白山中一定有更白的东西/造山之前它早已存在//泥土如泥土，石头如石头/大面积的白高过常识//在白山上每天白想一遍/草木在山中不生不长”，这首奇思妙想的《白山》，充分佐证了轻与重、有与无、形象与哲学交欢的魅力。路东从容转动文字的魔方，放飞语言的千纸鹤，极尽变化之能事；如此文本，是对读者智力的挑战，也是对读者智商的尊重。

路东笔下驱遣白马、流水、尘埃、花朵、时间等寻常意象，予以诗性的升华。以气驭剑，运斤成风；路东的人和诗，都具难以言说的巫者气质和简朴飘逸的侠士风采。读他那些云行水流般的诗章，有一种奇妙而酸爽、飞翔或下坠的感觉。《青梅竹马》句式清淡如儿歌，意象的生成与设定近乎美丽童话：“一提到青梅，一群竹马/就从熟悉的句子里奔跑起来/更小的竹马也亮出了马蹄/一路喊叫着青梅的名字//它们每天都这么喊叫着/总让我不能安然入眠/我只好在比喻的尽头坐下来/等入夜后安静的月光”，然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内涵与底蕴，又岂是儿歌和童话所能包容。

张宗刚

入木岂止三分



《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这是我一辈子刻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这些木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不离不弃地过了九十六年。”贯穿了黄永玉80年木刻生涯的400余幅版画，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散发出灵动洒脱、历久弥新的美感，它们好似一个个嵌入不同时期的舞者，最终以起舞的姿态被装订成册，形成了《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一书。木刻，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作之的技艺，可谓其艺术之根本。浓墨重彩的黄氏国画背后，深藏着木刻的理性思维，无论刀底、笔下，所刻、所画皆饱含黄永玉的情之所至、生命所有。

作为黄永玉的首部版画全集，该书题材涉猎广泛，涵盖了市井生活、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各地风景等多个方面，翻阅其间，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历史记忆和尘封的感动。反映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是黄永玉版画的一个特点，冷峻的刻刀沁润着悲悯情怀。《石子碎了，眼睛花了》，一个颧骨高起、眼眶深陷的枯瘦老人，手持长柄榔头砸石子，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儿，似在哀叹；《孩子渴了》，一位赤裸双脚的母亲背向接水的木桶，哺育幼鸟般向孩子嘴对嘴喂水，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背负着的幼儿渴了，也只能用体温中和一下凉水，奶水应该是没有的吧；《丈夫买药回来了》，窄床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生命危在旦夕，费劲周折终于买来药的丈夫，满脸愁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齐心协力收庄稼》，硕大而饱满的稻穗、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来回穿梭的孩童，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图卷；《做了几十年工，想都不敢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老师傅喜笑颜开，小徒弟英气逼人，传承的不只是工匠精神，更是一种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豪情；《大冬瓜》，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后共同担着竹篮，里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两人对视而笑，由画面可知其心灵上的愉悦与满足。

孩子，是黄永玉版画作品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报童》《擦鞋童》《没书读的孩子》，为了糊口早早进入社会，受尽白眼，满是心酸泪；《受伤的孩子》，孤零零地倒在街头，背后是一串带血的脚印；《读书郎》，朝气蓬勃，尽情在知识的海洋中倘佯。黄永玉为童话、寓言故事创作了大量的木刻插图，比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采月亮》《红鼻子的姑娘》《光屁股国王》等等，天真趣味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丰富了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的形象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的儿童文学《在森林中》创作的所有木刻插画。森林小学、林场生活、林中动物……粗犷的线条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童趣，足见夫妻两人琴瑟相合的默契。据说，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拮据，曾在理发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而张梅溪让他去理发。等黄永玉理完发出来，张梅溪手捧一块崭新的木刻板，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

刘学正

陆游乡居生活研究



陆游是诗作保留迄今、数量最多的中国诗人，达9362首，现存陆诗四分之三以上是六十六岁之后闲居农村时所作。陆游初学诗歌，受到江西诗派影响。该流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以吟咏书斋生活为主，重视文字的推敲技巧。后来，陆游入蜀从戎，深入民间，不再满意封闭的书斋写作，84岁时，陆游作诗《示子遹》，回顾了自己诗风的转变，末尾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可见，陆游诗歌创作和生活的紧密关系。

包伟民是浙江宁波人，从小喜爱陆游诗词。包伟民意识到，围绕陆游诗歌展开论述，可能是两宋乡村社会史研究不错的入口。于是，就有了《陆游的乡村世

界》。

这是一部探讨南宋文人乡居生活的论著。包伟民认为，通过对个人生活史日常生活具体个案的研究，能够观察分析中国两宋时期县级政权之下基层的乡村社会，有助于消除宋代社会生活史研究比较笼统的认识。包伟民放弃了关注各种社会科学问题的传统研究思路，致力于利用宋代文人留给我们的海量田园诗来复原两宋时期的乡村图景和社会结构。

包伟民希望借助陆游“乡村世界”的个案能够比较集中地提供三个方面的信息：其一，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公的生活范本；其二，关于士人在乡村的社会角色的某些侧面；其三，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其他一些生活场景。

“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倚杖》）包伟民撷取消新平易、朴素自然的精华陆诗，展现农耕劳作和田园风光。这些诗歌散落在文本各处，与历史讲述和谱地结合在一起，呈现了包伟民治史能力与文学鉴赏力的有机结合。陆游生活的地方在钱塘江南岸的越州，就是今天浙江的绍兴地区。“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才。”（《舟中作》）包伟民借助陆诗讲述了山会地区的开发史，与陆游关于居处三山别业及其周围地区地区村落的描述，相互印证。

借用陆诗对南宋乡村役人员的描述，“茅亭细雨湿炊烟，江路清寒欲雪天。

不爱相公金络马，羨他亭长白篷船。”（《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包伟民梳理了一部“中国古代保长简史”。“世通婚姻对门扉，祸福饥饱常相依。”（《谕邻人》）包伟民由此感知山会地区农民的婚姻圈较为窄小，并由婚姻圈谈及宗族组织的信息。陆游诗曰：“市桥压担草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初夏行平水道中》）陆诗经常谈及租佃买卖，作为细节补充佐证，可见两宋商品交换的繁盛情景。

陆游乡村世界的基础是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经济。两宋正是中国稻作耕种的鼎盛时期，山会平原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水稻种植，《喜雨》《村饮》《农家歌》等诗作，宛如图画，场景分明。“蚕麦俱收”等劳作书写，涉及植桑技术母枝压条之法。缫丝织帛酿酒种花等日常描绘，与南宋时人笔记或经济谱录对照，可作为微观史证。三餐米面，肉食菜羹，那就更是直观的饮食文化史料了，足可仿制一桌琳琅宋宴。

这些诗歌及其引出的历史话题，构画了生动鲜明的两宋乡村社会特征。不过，诗歌记事写人往往并不是完全写实的，更多地是为了抒发诗人的情感，所以，诗歌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的信息是应当存疑的。另外，尽管陆游存诗极其丰富，据此作为如此众多的历史侧面的材料，依然显得薄弱细微，也不乏勉强拖拉的弊病。作为一项尝试，这本书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赵青新